

从新疆民众抗日救亡捐献运动中起到的推动作用

看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杨磊

1938年8月24日，10架战斗机在成都机场腾空而起，飞往抗日前线，参加了“武汉保卫战”，给日军以猛烈打击，这10架战斗机被命名为“新疆号”，是当时新疆各族群众在国难当头之际，节衣缩食捐献的抗战飞机，是新疆民众抗日救亡捐献运动的一个缩影。抗战时期新疆各族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捐献运动，展现了中华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好历史见证之一。

新疆民众抗日救亡捐献运动的开展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后，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便发动了第一次抗日募捐。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从1938年寒衣募捐、1942年文化劳军，再到1943年“鞋袜劳军”“一县一机”运动，新疆民众的抗日募捐运动与抗战相伴始终。

现金募捐。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后，新疆献金运动开始，省城公务人员以12月的两日之薪捐助绥远抗日将士，军人、学生自由捐助，共募集省票银9000余万两和一批皮衣。全面抗战爆发后，迪化成立了新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会，此后全疆各地相继成立分会，并在所属各地组织民众发起捐献运动，据《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载，机关团体公职人员、学生、农牧民、商人等均参与其中。从1938年开始，抗日救国后援会把抗日捐献作为经常性运动，在“一切为着抗战的胜利”口号下，新疆人民开展了广泛而热烈的募捐运动。

寒衣募捐。1938年10月在反帝联合会秘书长黄火青的倡议下，新疆募集寒衣运动委员会在迪化成立，从1938年至1942年，新疆先后开展了4次寒衣募捐运动，募捐所得处于全国前列，极大地支援了前线抗日。1938年10月第一次寒衣募捐共募得25万元，1939年10月第二次共募得20万元，1940年8月第三次共募得20万元，第四次寒衣募捐运动由于盛世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迫趋于停止。

“一县一机”运动。除1938年新疆民众捐献10架“新疆号”战斗机外，1943年新疆又响应“一县一机”运动，7月组建了献机运动筹备委员会，并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呼吁各族民众积极投入到抗战救国的洪流中去，到1944年8月，共捐献飞机144架，超过原计划64架一倍多。

此外，新疆还在1938年发起防毒募捐运动，截至1939年12月，募得7万余元之多。1942年10月发起“文化劳军”运动，1943年4月“鞋袜劳军”运动开始，募捐成效突出，这些募捐而来的款项和物资极大地支援了前线战事。

中国共产党在募捐运动中起到的推动作用

新疆募捐运动取得巨大成就，与中国共产党起到的重大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关注新疆，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先后抽调、派遣党员干部100余人到新疆工作。中国共产党人进入新疆后，将宣传马列主义与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起来，陈云、滕代远等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于1937年10月间在迪化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抗日募捐的主要宣传、组织机构反帝会、抗日救国后援会等均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领导。共产党人俞秀松牵头对1934年成立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进行改组，改组后由俞秀松任秘书长，并修改了章程，增加了有利于团结抗日的该内容，经过改组后的反帝会真正成了一个群众性爱国组织，“几乎公职人员和中学以上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1938年黄火青担任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并调入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部、科领导，把反帝会改组成为统一战线组织。

以反帝联合会为主干，抗日救国后援会、妇女协会等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动员和组织各族妇女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在10架“新疆号”飞机中有1架就是“妇女号”。在教育系统，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被安排在教育厅、各地教育局、各级学校担任主要领导或教师，“在事实上把教育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下”。这一时期共产党人领导的教育界，最大的成绩是把大中小学学生从狭小的课堂、校园里解放出来，把读书与祖国的命运和自己的责任结合起来，组织青年学生积极投身于各项抗日救国运动，募捐寒衣、钱款、深入街头巷尾宣传抗战救国。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充分宣传和组织，依托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等，新疆各族知识分子、爱国青年和农牧民等被广泛地动员了起来，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热情被不断激发，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与中华民族意识的全面增强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抗日战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自觉，是中华民族由自在走向自觉的关键转折点，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华民族由自在走向完全自觉提供了精神引领。抗日战争时期，瓦尔堡会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并将解决民族问题纳入抗日救国政治行动的整体范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是各民族共同的神圣事业，并在此过程中对自身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一系列认识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逐步提出，也成为陆续进入新疆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开展积极有效的抗日宣传，促进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重要因素，抗日捐献运动是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重要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以全民族共同抗日为目标，发动新疆各族群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新疆各族群众的中华民族责任感不断得以增强，陈纪澄在《新疆鸟瞰》中记载道：喀什疏勒县60岁的农民阿特汉，当问及是否知道中国和日本交战的事情时，他说道：“我们对详细情形虽然不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日本鬼子是可恨的！我们当地农民都知道。回去以后一定把在大会上听到的消息传达给他们，呼尔加（维吾尔语称农人为“呼尔加”）也是中国人，也要数国啊！”疏附县18岁的维吾尔族学生代表依敏江说道：“维吾尔族青年们都知道国家危亡的情形，希望把维吾尔族青年们关心祖国的热情传达给国内同胞知道。”于田县的维吾尔族同胞说：“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因为地方远，就不负起救国的责任哪！我们回去要宣传，要募款捐助政府，救了国家才能永过太平日子。”

在抗日救亡捐献运动中，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精神也得到升华，民族凝聚力爆发，1929年新疆回部八王公上书，在《回族劝告书》中写道：“我回族亦五族之一分子，国家存亡荣辱有关。敝部各王公将领爱国之心不后于人，一旦国家有事，愿征精兵贰百万，以备国防、援助政府而强我中华神州。”在迪化的献金运动中，一位七八十岁的维吾尔族老奶奶听了日寇在中国奸淫杀戮的暴行后，眼含热泪，当场摘下佩戴的金耳环送上献金台，在场的无人不为她的爱国行为动容。和田维吾尔族农民艾沙因其家境贫寒无力捐献，愿将18岁儿子玉素甫送往前线，并称：“倘其不忠实抗战，宁死不见子面。”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族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深入人心，团结一致募捐支援前线的革命行动是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力增强的一个缩影，它印证着中华民族“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遐迩一体 文共四方

——中华民族经典文化符号《千字文》

□ 郑蕊

《千字文》是中国古代启蒙识字教育的一部经典教材，由南北朝时期的周兴嗣所编写。南朝梁武帝萧衍为了教诸王书法，让人从王羲之的作品中拓出了一千个不重复的字，交给周兴嗣整理。周兴嗣冥思苦想，一夜白头，编成了蒙学经典《千字文》。

《千字文》对仗工整、条理清晰、富有哲理、寓意深刻。明代王世贞称其“绝妙文章”。章太炎则评价此书“独领蒙学读物风骚，堪称训蒙长诗”。经过了一千多年的传诵，《千字文》更是成为中华民族经典的文明符号、各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以及各民族广泛认可的编号系统。

“书法圣经”传世，翰墨明珠璀璨

《千字文》缘起于梁武帝对王羲之书法作品的喜爱，是书法史上产生经典最多的文本。隋唐以降，后世书法家争相以此为题材临摹创作，留下了许多不同书风的《千字文》法帖。

最早痴迷《千字文》书法的，是隋朝的智勇和尚，作有《真草千字文》八百本。他的《真草千字文》既有“二王”笔法，又兼自身风貌，影响了楷书规则的建立。

到了唐代，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不少名家都曾书写出《千字文》的名篇，如虞世南的《真草千字文》，曾被宋高宗赵构临习；欧阳询的行书《千字文》笔力刚健，擒纵得宜。此外，褚遂良的楷书《千字文》对宋徽宗瘦金体风格的形成影响很大。后续唐代著名书家，更是接续创作出传世名篇。如怀素晚年所书《小草千字文》，被称为“天下第一小草”。再如号称“草圣”的张旭，留下宋人模刻的残碑《断千字文》。

及至宋代，《千字文》依旧是书法作品的重要题材。今天还可以看到，蔡襄的《临智勇真草千字文》、黄庭坚的行书《千字文》、米芾的小楷《千字文》、宋徽宗的中楷瘦金体《宋徽宗真书千字文》手卷、宋高宗赵构的

《赵构真草千字文》等等名作。元代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是继智勇和尚之后，写《千字文》最多的一位大家。他写的篆书《千字文》、真草《千字文》、草书《千字文》、行书《千字文》等法帖或端雅挺劲，或书法精熟，都是传世名作。

时至明清，《千字文》书法依然流行，传世名篇如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徵明的楷、草、隶、篆四体《千字文》，清代邓石如《篆书千字文》、席夔《隶书千字文》、张照楷书《千字文》等依然广受追捧。

一个文本，传承千年又受到历代先贤的深度关注，经典频出且得到各朝学子的临习摹画。《千字文》的灵魂，已经通过历代学子书家，篆刻到文明的核心，融入学统之中了。一卷卷《千字文》法帖中，我们可以看到历代才子对书法艺术的极致追求，也能通过缺笔、换字、帖黄、跳字等不同时期的避讳特色感受到历史的变迁。《千字文》法帖本身就是意蕴丰富、文明传承的小百科。

精粹多族传承，记忆万方同享

《千字文》的广泛流行，还成就了我国各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今天，我们在新疆吐鲁番文书、西夏经文、回鹘卷子、敦煌文书等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千字文》的文献遗存。如吐鲁番巴达木墓出土的写本《千字文》残卷，其中“叶”字不避唐讳，推测其年代为高昌时期。又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墓中出土有唐代贞观、武周、天宝等不同时期的《千字文》习字残卷，可以想见，《千字文》至迟在贞观时期已经传播到这一地区。

西夏时期大量翻译汉语经典文献。为了推广新创的西夏文，西夏人曾经仿照《千字文》，编写字书《碎金》。《碎金》将一千个不重复的西夏文编诗成句，编排方法和叙事逻辑明显受《千字文》的影响。有意思的是，除了常见的党项语西夏文大量借鉴汉

语文献之外，学者发现西夏存在过的勒尼语文献中，有很多是利用西夏《千字文》进行排序，可见汉语《千字文》的世界观和排序功能在西夏地区影响较深。

广泛活跃在漠北蒙古高原、河西走廊、吐鲁番等地的回鹘，也曾利用《千字文》学习汉文。我们在柏林、巴黎、圣彼得堡等地的敦煌文献中，还能看到很多回鹘文《千字文》残片。这些残片，既有汉语回鹘文夹杂出现的合璧《千字文》，也有为了突出读音汉语部分以回鹘文注音形式出现的。前者便于根据夹杂的汉语翻查汉文经书，核对内容，进一步加深理解；后者则突出了利用回鹘文标注读音的汉语口语学习方法。

此外，敦煌藏经洞还曾发现过汉藏对音《千字文》。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在汉字的左侧附上了藏文的注音，学者认为应当是操藏语的吐蕃民众为了方便诵读汉字，用藏文来记录汉语的发音。

到了清代，民族文化交流互鉴进一步加深，多种民族语言的合璧文献广泛刊刻。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多个版本的《满汉对照千字文》合璧文献，以及用满文标注读音的《新译蒙汉千字文》，满蒙汉三种文字应对配合的合璧本《千字文》。

穿越千年，横跨神州，《千字文》已经成为一条神奇的文化纽带，链接了古今各族的文明遗存，成为我国各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

经典流传千年，成就特色排序

得益于文字没有重复这一特征，《千字文》不仅文本流传广泛，还成为普遍认同和使用的编号系统。我们在传统文书、科举考试、社会生活等方面，常常可以看到《千字文》的排序标注。

传统文书中有许多政务文书和簿籍用《千字文》编号。到了宋代，《千字文》就成为文书编次的重要逻辑之一。文书递角、边关急文、官员任免凭证、司法

事务簿、敕号簿、度牒等政务文书；税赋簿、农田土地簿、契纸盐引等簿籍中常常用《千字文》编次。

科举考试中，《千字文》也常用来排序管理和预防“预先关会之弊”。清代科考时考生以试卷上的《千字文》编号为基，以座号便览为导，来找相应的号舍。考生的试卷在考后戳印弥封《千字文》字号，以防舞弊。

社会生活中，《千字文》的编次也是十分常见的。学者发现，《千字文》被当作编号系统进行使用，源于佛经经藏之中。宋元以来，《赵城金藏》《资福藏》《磧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等经藏，都使用《千字文》作为帙号。此外，《千字文》编号在社会管理中用途广泛，涉及到皇室恩赏、粮仓排号、军队组织、藏书排架、作坊里舍、弃婴登记等等。

基础编号之外，古人更是利用《千字文》人人熟悉的特点，创造了以《千字文》为号，以岁月（排序）为次的“千文架阁法”进行档案排序和管理。“天字第一号”成为民间耳熟能详的排序号。直到今天，我们在天南海北都能看到利用《千字文》排序的各种房屋、档案等。

《千字文》中阅千古，训蒙书法铸丹心。《千字文》传承千年，誉满神州，堪称中华文明史上重要的文化瑰宝。今天读来，我们仍然可以从《千字文》中体会文明传承中的流光溢彩，汲取智慧和力量。相信在神州每个角落，我们看到听到《千字文》，都能够感受到“遐迩一体，率宾归王”的精神归属感和“化被草木，赖及万方”的精神一统、海晏河清。



修德以怀远

□ 葛斯青

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许多保存至今的古地名都是千年历史的见证。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以数字、字母命名街道不同，在中国，很多地名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他们从古传承至今，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承载着一代代人美好的愿景。在这些地名当中，带有“怀”字的地名并不少，例如湖南省怀化市、北京市怀柔区、山西省怀仁市、河北省怀安县和怀来县、安徽省怀宁县和怀远县、广东省怀集县。“怀”究竟是什么意思？何以频繁出现于地名中呢？

“怀”字金文本作“𡩊”；篆文改为从心从襄会意，“𡩊”也兼表声；隶变后楷书写作“懷”；如今简化作“怀”。《说文解字·心部》：“懷，念思也。从心，襄声。”本义为思念。“𡩊”与“襄”同源，皆与衣袖襟怀有关。“𡩊”指衣袖，又指用衣袖兜住东西，有包围、怀藏的意思，引申为怀抱。物理上的怀抱推移到心理即挂念，这也是《说文解字》中“怀，念思也”的来源。把别人拉进胸怀，说明心里有此人，怀柔远人，因此“怀”字有招来之义。《尔雅》：“格、怀，来也。”即是说“怀”引申有归向、到来的意思。

既然“怀”字有思念和使人归附之意，便不难理解为何一众地名都带有“怀”字了。唐太宗于贞观年间设立怀柔县。“怀柔”取自《诗经·时迈》“怀柔百神”，是讲周武王克商后封诸侯，巡行各邦、安抚百神，以发扬光大祖先功业。《中庸》亦有“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唐太宗命名此县，意为对北方少数民族招来安抚，使用怀柔政策。怀安始置于唐长庆二年，取“朝廷施行仁政，百姓怀恩而安”意。宋代时怀化地区为少数民族之地，将此地名名“怀化”，取意“怀柔归化”。怀来曾名怀戎，亦表示安抚少数民族。因“戎”字有轻视少数民族之意，辽太祖改怀戎为怀来，消除敌意。总之，将“怀”字放入地名，表达了统治者对当地和平安定的希望。

何以使远人归附呢？“怀”字在《尚书》中出現二十余次，大有以“德”怀人之意。如《尚书·仲虺之诰》“德日新，万邦怀怀”，意为日新其德，可使万国归附。《尚书·太甲下》“民罔常怀，怀于有仁”，意在民众只会归向有仁德的人。《尚书·周官》“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即用公心消除私欲，民众将心悦诚服。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为政》“道之以

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说明德教可激发人的自律意识，这样化被动为主动，更有利于日后团结和谐。做到以德感人的核心则是执政者向内求，《中庸》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能够取得这样的外拓效果必然离不开自身的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德”的反面是“武”。《老子》中讲“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司马法》告诉我们“国虽大，好战必亡”，用武虽也能使远人服从，但不仅会自损，还因对方归附非出于内心，从而带给未来更多的冲突与麻烦。

现实中也不乏以德怀远的例子，武力没能使人屈服，放弃武力反而使人主动归顺。《尚书·大禹谟》中记载，三苗部族残害百姓，道德沦丧，与中原地区发生战争。舜帝曾经派禹去征讨三苗。三十天后，他们虽暂时被武力所震慑，但并没有被完全征服。此时伯益向禹提建议说：“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只有德行可以感动上天，无论多远都能到达。禹随即撤回军队，舜帝又对其进行礼乐教化，利用人性善的一面加以感化。七十天后，三苗终于主动前来归顺。《史

记·南越列传》记载，南越赵佗趁楚汉连年争战时并三郡而称帝。汉高祖遣陆贾为使招降，赵佗应允，但高祖去后吕后却对赵佗使用了敌对政策，赵佗心生愤怒，又叛汉起兵自立。至汉孝文帝继位，修治赵佗先人冢，修书安抚，又派陆贾出往。赵佗随即撤兵，称臣修和，岁岁奉贡。唐朝的强大也不只是依靠武力去征服，更多采用怀柔政策，对于周边游牧民族因俗而治，征伐为辅，尽可能避免暴力冲突，这些措施奠定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础。

“怀”字的内涵不仅见证历史、代表地域，更面向未来、走向世界。中国人自古以来把天下视为一体，成就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与和平性。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一脉相承，在今天又发扬光大，今天的中国人立足中国，胸怀天下，放眼未来，致力于世界范围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赓续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